

“习近平即将访美”备受世界舆论期待

美国媒体周一爆出特朗普总统将在4月上旬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双方将在佛罗里达马阿拉歌俱乐部举行首次会晤的消息。美中官方随后表示，中美元首会晤的相关筹划仍在进行中，双方就此保持密切沟通。然而美国领导人更迭后中美首次元首会晤即将举行，已被全球舆论当成“确切的新闻”来看待，细节的尚未确认没有影响人们期待的热度。

中美元首会晤是很大的事，它很可能为今后4年的中美关系定调，同时也会影响整个亚太的氛围，习特会的这一意义显然被普遍看到了。

如果习特会在未来不到一个月就举行，那么这将是美国新任总统与中国元首迄今最快的访问加会晤安排之一。这一信息同样被认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他的对华态度曾经引起广泛疑虑。到了现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可能脱轨”的悬念大体排除了，中美关系重新站在以往厚

实的基础之上。然而北京与华盛顿的全面关系仍有一些“填空题”要做，中美贸易、朝鲜半岛危机、南海问题等仍有待双方进一步沟通，营造建设性处理它们的局面。

客观说，上述问题在中美之间都不是新的，中美围绕它们的互动模式经过了反复磨合，包括一些磕磕碰碰，双方既获得了不少相处的经验，也有一些教训。人们期待习特会为两国在未来4年更积极地面对共同挑战，也使双方更和谐地维护两国社会的庞大交往做出原则和态度上的务实。

每次中美高层会晤前，美方都会把他们最关切的问题对舆论做吹风。其实中国方面也有自己的问题排序。美方近日提出与中国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有建设性的关系”这一概念，关于它的论述还不是很多。我们希望，这种提法

的价值取向是中美共同利益，而非个别媒体解读的“美国关切”。只有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才是大国建设性关系的生命线，相信华盛顿外交界深谙这个道理。

蒂勒森国务卿星期三将开始东亚之行，星期六到北京，而中国是他此访的重要一站。据信他将为安排中美元首会晤与中方磋商，此外朝核问题和“萨德”危机也是他日程表上的突出议题。

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中美对突破这一难题的思路有差异，美方不应试图让中方全盘接受它的想法，双方共商且相互尊重彼此利益，把半岛无核与持久和平放在最高位置，这些应该成为中美商谈的基础。

习特会即将举行，这个消息本身就为中美关系带来了乐观，在仍有不少中美关系“不确定性”议论的时候，这一消息让人们看到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相互关

系大的确定性。未来的中美关系很可能比去年底一些人们猜想的那样要积极得多，也稳定得多。

中美两国历经蹉跎、困惑，似乎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实践积累，那就是：无论两国之间有多大的分歧，无论某些人在某些时候针对那些分歧有过什么样的冲动，最后两国共同选择的都是协商、合作的非对抗方式解决问题。这样的积累也似乎在推动两国社会都形成一个认识：通过协商谈判解决纠纷而非进行对抗是合乎中美长远利益更加现实的选择，它给任何一方带来的好处都要比恶斗的后果强得多。

合作共赢、避免对抗已是中美两大国处理彼此关系的唯一选择，这或许就是一个历史结论。我们真心希望中美元首会晤能早日顺利举行。它无疑将为解决当下一些紧迫的问题提供动力，与此同时，我们更期待习特会为中美两国做出面向未来的战略塑造，它也会因此而载入史册。▲

终结“亚洲世纪”，西方操碎了心

苏浩

前不久，美国著名的保守派智库企业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奥斯林出版了一本题为《亚洲世纪的终结》的书，一反国际社会对亚洲的积极正面评价，给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相反结论。他认为亚洲充满了潜在威胁、政治走向动荡、经济处于滞胀，似乎这个一度充满生机的地区存在巨大风险。事情果真如此吗？

“亚洲世纪”与“海洋时代”

进入21世纪以来，“亚洲世纪”成为国际政治和学术界常常提到的一个概念。其含义是指在国际社会进入新的世纪以来，亚洲国家不仅在经济上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2008年后西方经济迅速衰退，也拖累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亚洲则被视为全球经济黑暗场景中的一个亮点。因此，国际社会有不少人认为21世纪应该是一个“亚洲世纪”。

国际关系的“世纪”说是在学术界常常使用的概念，与此相关的提法还有所谓“时代”说。西方学术界曾把19世纪称为“地中海时代”，以此描述欧洲国家通过对外扩张和征服而统治大西洋的事实。20世纪则是“大西洋时代”，因为世界被大西洋两岸的欧美国家所主宰。早在20世纪初期，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认为太平洋是一个能提供大规模扩张的区域，是世界强国争夺的主要舞台，因此预言说人类社会必将进入“太平洋时代”。

1941年美国著名出版商亨利·卢斯声称美国将在战后以其强大的实力为世界提供管理经验，因此一个“美国的世纪”将来临。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就开始在炒作所谓“太平洋时代”的概念。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家们建构单极国际体系的野心更加膨胀，甚至制订了主宰世界的“新美国世纪计划”，以图固化它所主导的环太平洋政治安全秩序。奥巴马政府曾公开宣称将通过跨过大洋的“战略再平衡”行为，建构一个“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显然，这种海洋“时代”说和“美国世纪”论，说明近代以来国际政治经历了一个西方主宰的自西向

东演化的不同进程，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逻辑，即为强权政治的争夺和霸权主宰的实现，提供一种宏观的理论概念支撑和解释。

西方试图终结“亚洲世纪”

然而，冷战结束后，“非西方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安全局势动荡和经济金融发展停滞衰退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以亚洲国家为主体的亚太地区整体局势稳定，经济稳步发展，亚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日益增强。特别是在东亚、南亚和中亚地区，政治总体稳定，经济发展速度较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升，跨国间和区域内的国际经济合作普遍开展。仅中、日、韩、东盟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已超20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结构中除了传统的欧洲和北美外，东亚已经形成第三大重要的经济板块。亚洲大陆正在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老牌的欧洲国家明确认识到亚洲的重要性，早就通过“亚欧首脑会议”的机制化合作框架，努力促进两大洲的相互协调与融合。

当然，国际局势的发展总是复杂曲折的。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全球金融联通不畅，国际市场容量萎缩，给正在扩张的亚洲经济体造成巨大压力。再加上西方大国介入东亚和东亚的安全事务，导致地区冲突凸显和军事局势紧张。这就使得本文开头所提到的美国保守学者试图唱衰亚洲，以便重新鼓吹西方继续主导世界的勇气。这是一种西方人在面对亚洲人时的一种自负自大的传统表现，更是一种以强权政治为基础，在海洋时代追求愿望的彰显。在西方人眼中，“亚洲世纪”的表述会使他们产生一种酸涩心态，在阴暗的心理中总在酝酿着终结“亚洲世纪”的战略意图和行为冲动。

有人强调亚洲地区存在日益加大的战争风险，殊不知这种风险正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事介入。比如对一些亚洲国家进行直接军事干涉，部署威胁其他国家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武器装备，向有的亚洲国家的邻近海域派出航母舰队耀武扬威。这些行为正是导致亚洲现

实冲突和存在军事对抗的直接原因。换句话说，美国等西方国家正试图干预亚洲崛起的进程，以便最后能终结“亚洲世纪”。

亚洲给新全球化进程注入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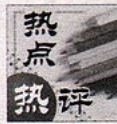
其实，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作为全球化的推动者却因其实力相对下降，而开始犹豫退缩。非西方世界却更希望在全球建立跨区域和区域间网络化合作框架，积极推动以全球治理为途径的全球化新进程。在这一新全球化进程中，“亚洲世纪”并不是亚洲人的行为目标，更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去追求对世界的主宰。但亚洲在世界事务中所占的分量已大大增强则是一个不争的客观现实。

亚洲是全世界面积最大的洲，人口最多且密度最大。它在地缘上是亚欧非三大洲联结，与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和地中海四大海洋互动。亚洲大陆是一个政治多样组合、经济多层融合、文化多元一体的独特区域。对这一多元化大陆的治理，将预示着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新型的国际社会治理模式，甚至比西方文明更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

正因为认识到亚洲的这一前景，在今年1月印度政府主办的“瑞士那对话会议”上，印度总理莫迪突出强调印度要在已经到来的“亚洲世纪”中扮演重要角色。

作为亚洲最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世界经济的溢出效应十分突出。中国以占世界八分之一的总量，却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三分之一的贡献率；中国巨大的进出口贸易和对外迅速增长的对外投资，以及每年上亿人次的出国旅行，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

中国政府提出跨亚欧大陆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呼吁建构全球伙伴关系而实现全球经济治理，愿意为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发挥积极作用，主张基于亚洲合作共赢的实践而倡导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见，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拥有推动新全球化进程的活力和动力。▲（作者是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2月底，年逾八旬的沙特国王萨勒曼开启了为期一个月的亚洲之行。在相继访问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后，萨勒曼将于今天至18日访问中国。考虑到沙特当下内政外交的处境，沙特国王的亚洲之行并不轻松，相反这是一次承载着太多诉求和重任的出访。

2011年的中东变局以来，在“阿拉伯之春”中屹立不倒的沙特曾经一度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领导海湾合作委员会，在阿盟和阿拉伯世界处于主导地位，力图在阿拉伯国家转型以及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但在美国中东战略调整、地区形势急剧变化、低油价重创沙特经济等内外因素的影响下，沙美同盟关系龃龉不断，地区外交接连受挫，经济转型压力巨大，都使沙特的内外环境十分严峻。因此，萨勒曼国王的亚洲之行既有寻求合作、助力国内发展转型的经济诉求，更有摆脱外交困境等多重考虑。

概括来说，萨勒曼亚洲之行有以下几大核心诉求：首先，向美国传递沙特外交转向强劲信号。近年来，沙特对美国的伊朗政策、叙利亚政策十分不满，特朗普在竞选中放言沙特应承担更多安全成本也令沙特不快。面对沙美同盟关系的倒退，沙特外交转向的势头日趋强劲，萨勒曼此次对中国、日本、印度、印尼等亚太大国和新兴经济体进行全覆盖式的访问，无疑

沙特国王亚洲行的诉求与重任

刘中民

疑是向特朗普政府传递更强劲的“向东看”信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沙美同盟关系会发生动摇，美国的安全保护仍是沙特的刚性需求，美国在地区事务上同样有求于沙特，沙特重视亚洲大国，更多在于增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资本。

其次，巩固和重塑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萨勒曼此次访问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马尔代夫都是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这些国家或者参加了沙特组建的打击“伊斯兰国”的34国联盟，或者在“9·11”事件以来在反恐问题上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如印尼、马来西亚）。当前，在对抗伊朗、干预也门事务、打击“伊斯兰国”等问题上，沙特都需要争取广大伊斯兰国家的支持。因此，通过访问亚洲的主要伊斯兰国家，通过经济援助和宗教纽带，彰显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显然是萨勒曼亚洲之行的重要考量。

最后，寻求经济合作，助力国内的经济转型。为摆脱单一石油经济结构和低油价冲击的困境，沙特于2016年提出了“2030愿景”规划，试图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实现经济的多元发展。据报道，沙特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提出了十分庞大的“国家转型计划”，该计划提出了350个具体目标，其落实需要大量投资。而经济多元化发展也需要沙特进行巨大的海外投资。

此次出访萨勒曼率领的包括沙美石油公司总裁在内的庞大的代表团，已在马来西亚、印尼和日本签署多项投资合作协议，而“2030愿景”与“一带一路”战略对接框架下的多领域合作，更将是萨勒曼北京之行的重中之重。▲（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

